

# 城市化进程中的 民族问题研究

周大鸣 马建钊 主编

民族出版社

# 城市化进程中的 民族问题研究

周大鸣 马建钊 主编

# 城市化进程中的 民族问题研究

周大鸣 马建钊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研究/周大鸣, 马建钊主编.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 11

ISBN 7-105-07331-4

I. 城... II. ①周... ②马... III. 民族问题-研究-中国-  
学术会议-文集 IV. D63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687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文化公司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360 千字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28.00 元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 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研究 及其发展趋向（代序言）

周大鸣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导师、教授，广东广州，510275）

马建钊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广东广州，510180）

为了筹备召开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并在筹办期间宣传和展示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将相应召开一系列研讨会。同时为了积极备战2004年12月12日在印度召开的主题为“大城市化、多民族社会、人权与发展”的中期会议，由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及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于2004年11月19日至20日在中山大学召开。这也是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组织召开的系列研讨会中的第一场。

大会一共有来自全国各地53名学者与会，收到45篇学术论文（发言报告），本书选出26篇结集出版。共分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国际都市化进程中的境外族群关系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问题研究”等四个专题。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涉及的面非常广，故本书只是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研究

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城市化是背离还是适应?如何看待少数民族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的关系?这些都是人类学界的热点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高丙中教授从如何看待都市化和公民社会建构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出发,根据对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分析,提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本身是一种很好的文化资本,可以用来应对都市化造成的人际疏离、社区归属感不强等问题。因而公民社会中少数民族的存在并不一定是问题,民族文化可能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与高丙中教授的理论探讨相呼应的是麻国庆教授的实证研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麻国庆教授以其多年的田野调查经验为基础,以呼和浩特为个案,针对当地清真寺功能的转变,提出了文化生产等重要概念,阐述了城市化进程中都市社区的变动与传统的再造。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犯罪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都市中既存在新流入的少数民族,也存在世居的少数民族。杂居、散居少数民族群众与汉族关系的协调存在许多问题,其文化与汉族的文化、生活习惯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协调是令各非民族区域自治的管理部门棘手的问题。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给输入地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造成一定管理上的困难:一是城市管理难度增加。二是民族关系协调难度上升。贵州民族学院的吴大华先生从城市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现状入手,研究了该群体的犯罪态势及其原因,并寻求控制此类犯罪的基本对策,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和犯罪控制提出建议,也为都市化进程中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犯罪提供了启示。

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杨庭硕先生以贵阳市少数民族街区的发展为例,探讨了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演变过程、社区概念的转变以及政府在城市再建中的作用,并建议在城镇化进程中建立民族街区,发挥其潜在的作用。吕永锋补充了杨庭硕先

生的发言，从另一个具体案例阐述了社区的变迁以及少数民族街区在城市的作用以及相关问题的解决措施。

国家民委政法司沈林处长从长期工作和实践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当前城市民族工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民族工作的缺失”和“民族工作的过度”等概念，为学者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与空间。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所的李筱文研究员论述了广州各级民族联谊团体，发现由这些团体组成的各种形式的联谊活动能从政治上、生活上保障城市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密切联系各少数民族社团组织，并利用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威信及时疏导、化解民族矛盾，确保了城市社会的安宁与稳定。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周建新通过乡村—城市移民社区研究，在反思以往社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人类思维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多变性和阶段性，提出移居社区的概念，为城市外来移民族群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文化传承和变迁以外，权力关系运作也是都市社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朱建刚副教授通过民族志调查，对相关都市邻里社区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反思。指出国家权力实际上在基层发生很大的扭曲或者抵制，而各类市民团体和邻里运动是这个空间的主要行动者。这些组织和行动一方面表达着国家权力的渗透，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国家权力关系的抵制和扭曲。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杜发春先生通过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神话”的反思，以珠江源地区为例，提出和探讨了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型城市化的生态环境观以及江河源头的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体现了相关领域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的关注。杜发春先生还认为中国西部地区加快其城市化进程应该借鉴加拿大城市化的有益经验。同时在对比加拿大和中国不同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化无现成的既定模式可复制；在追赶中超越，以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的理

念,树立新型城市化的“生态环境观”和“民族文化观”加速推进中国西部地区城市化。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陈运飘老师探讨了城市少数民族与城市社会研究的关系,尤其是分析了城市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包括城市少数民族对城市文化的贡献以及城市社会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等等。

###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问题研究

最近十几年来,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的历史产物。在此当中,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其生存状态的群体行为还涉及族群融合、文化冲突、传统持续、民族关系等相对抽象的深层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胡毅力副主任调查了河北清河县羊绒集散地2万少数民族商人社区的形成以及国家行为、管理机制转变的几个阶段,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少数民族在都市适应和发展的很好个案。这一研究也对都市中的民族问题处理带来了启示,要针对少数民族之所长,为其提供发展空间。

广东省民族研究所马建钊所长和陈晓毅博士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描述了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的少数民族员工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都市适应状况,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概念,指出了城市中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在建设和谐社会、促进人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深圳从一个单一民族的城市迅速发展为一个多民族城市,目前是北京以外的不同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城市(53个少数民族),因此深圳的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山大学的王琛和周大鸣以深圳为例讨论了城市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文中描述了沿海发达城市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居住模式和社会网络,指出了少数民族交往的特点;该研究也以深圳民俗村



为个案分析了不同少数民族聚居在一起所引起的矛盾冲突，也分析了企业文化对处理、整合少数民族关系的积极作用。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刘朝晖博士以拉面馆为切入点对厦门市穆斯林群体进行了田野调查认为，同其他的都市农民工相比，少数民族的城市适应与其说是通过个体社会关系的建构和扩张，还不如说更多地表现为群体性的社会适应。他们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从事类似的职业工种，秉承共同的宗教信仰，有着“城市的一员”与“城市过客”的双重角色。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研究生高崇通过对少数民族工人的研究探讨了民族文化在都市中如何被淡化和隐藏以及又是如何被展示的。他认为在强势的都市文化和资本力量面前，民族文化没有自主的发展能力，因此有必要为民族文化注入新的观念，增强少数民族自我发展的能动性。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马强通过对广州穆斯林群体的田野调查，以哲玛提为分析概念，提出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哲玛提：清真寺与墓地类型、家庭与家庭联合类型、公司与公司联合类型、国外宣教团、网络哲玛提、学生与工作者组成的哲玛提。通过分析指出伊斯兰的认同精神对哲玛提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刘诗伯对广州外来移民对基督教的认识系统地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分类研究及定性研究，讨论了外来移民信徒群体通过城市基督教会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影响。

云南大学人类学系马京教授对昆明的一个少数民族城中村进行了调查。这一研究可以说是都市人类学“乡—城移民”研究的典范。本文描述了新街村民向城市移民，在城中村聚居形成回民村，最后城市改造的全过程。通过分析，说明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从迁出地到迁入地的背后的家庭规模的影响、生计模式的变化以及其社会地位的起落。

宏观与微观的研究结合有利于为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效

管理提供对策。周大鸣与王挺的论文通过对广州市H区的调查分析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治理和对策,调查了城市街区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治理状况,分析了目前的治理模式,指出了治理有效性的不足,最后提出了三点对策:一是形成治理网络,加大治理力度;二是积极引导外来少数民族适应城市生活;三是转变治理观念,寓服务于治理之中。

### 三、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问题研究

工业化、城市化可以说是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和理想道路,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了环境劣变、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社会两极分化等后果,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神话”。

城市化还受到具体地域、经济状况、社会组织和传统文化的制约。民族地区如何实现城市化?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王建新教授以吐鲁番市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提出地区的资源与开发应该走有地方特色的道路;经济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相结合的绿洲开发模式可以成为有推广性的地域性模式。

南开大学民族研究所高永久教授用生动的例子说明了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文化碰撞和文化变迁的问题。围绕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城市高速发展和拆迁导致的少数民族边缘化、城市化对少数民族信仰的冲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就城市化和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协调发展提出了看法。

城市化的道路选择与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王欣先生通过调查新疆牧区定居以后的经济、社会、生活等方式的转型情况,指出该地区虽然在目前已经向城市化生活方式转变,但存在着严重的就业问题和文化断裂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者重视的角度。

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的孙九霞女士认为在乡村都市化过程中旅游业的介入,为民族地区提供了另一种发展道路:旅游发展成了民族地区乡村都市化的外部推动力量。这种类型的都市化道路实

现了民族人口的就地非农化。但同时都市化进程中也应注意考虑自然和文化资源保护。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邓启耀教授以云南巍山古城在文化保护与重建过程中存在的文化生态与经济矛盾的案例，讨论了在古城保护与发展中专家学者与政府如何分工合作的问题，并提出了专家对城市改建有说“不”的权力。

中南民族大学的许宪隆先生认为都市化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流动都会成功。他列举了宁夏灵武穆斯林王氏家族在近代社会的变迁，勾画出一个从乡村到都市、从都市回到乡村的运动轨迹，这一回流特例给我们的启示良多，对当今社会的人口都市化、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的都市化研究都有相应的启发意义。

青海民族学院的马成俊先生通过对少数民族迁移的发展项目的考察，展示了少数民族自身、专家组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互动，并呼吁社会更多关注青海地区少数民族的发展及其未来的发展道路。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朱爱东副教授通过对云南宣威彝族村落的考察，展示了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该村落的民族认同在城市化的冲击下，民族文化特色不断消失，仅能在民间信仰中略微看到彝族文化的痕迹。

怎样使藏区的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梅方权以西藏昌都的城市化为例，试图说明藏区城市化进程中畜牧业、特色产业和宗教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在地广人稀的藏区走一条非工业化、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之路。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聂爱文以昌吉地区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及交融现象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并运用人类学分析方法，提供了一份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如何互动、濡化的个案。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杨小柳在贵州省安顺市西秀

区青苗村寨——汪村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展现了少数民族村民参与适应城市化的过程及其面临的障碍，从而引出对“谁是城市化主体”问题的探讨，指出政府和少数民族村民应共同成为城市化中平等合作的主体。

都市化不仅仅是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也包括都市生活方式向农村的辐射。乡村都市化在少数民族地区有何特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湛华玉以潮安县石鼓坪李工坑畬族村为例，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凤凰山的适应策略。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范可教授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国家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契合问题。以百崎“再地方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紧张”为例，说明了一个社会从不完善到接近完善的过程，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日益增加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是对政府与民众沟通之重要性的积极提示。

中央民族大学的杨筑慧副教授对西南民族地区妇女的人口流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改革开放后，西南民族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妇女无序地大量向中国中东部汉族地区跨区域、长距离的迁移，并由此给流出地和流入地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同时引发了流出地的传统文化变迁。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王琛以少数民族妇女为调查对象，展示了其在城市化过程中走出家门，以贩卖民族特色饰品为业，形成一个特殊流动群体的过程。详细分析了少数民族妇女在城市化进程中经济生活角色的变化。

少数民族妇女除了流入城市获得现代性以外，在本地是如何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变化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李溱以广西上林县大丰镇北关村田野调查为基础，探讨城市化背景下壮族女性的发展和现代角色获得。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李宁利讲师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从自梳女产生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出发，系统研究了珠江三角洲这一特殊群体的产生根源和内在结构、亚文化特色，归纳了自梳女与整个缫丝业发展的紧密关系，

反驳了自梳女是反抗封建婚姻、妇女解放的先驱的观点，提出自梳女依然是对男权的屈服。

中山大学外语学院的何家祥先生对“水上人”的族性界定问题进行了研究。

与何家祥的研究异曲同工的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张振江副教授对汕尾水上居民的研究。他以城市化进程中水上居民的逐渐消失过程为基础，结合香港的类似现象，提出了水上居民作为一个族群将不复存在的观点。

#### 四、国际都市化进程中的境外族群关系研究

族群的跨国流动与多元族群的共存是世界的普遍现象。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柯群英女士以新加坡的小印度为例探讨了国家与族群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多元族群模式成为新加坡绝大多数社会和发展政策的指导原则。对“小印度”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想象的国家认同和在族群内部想象的多元种族两个认同形成和互动的过程。

中国的跨国族群互动在大学的留学生社区比较明显。广西民族学院秦红增教授以N市G学生社区为例论述了国际化城市中东南亚留学族群与中国大学生的矛盾极其消解的措施，用翔实的田野资料展示了实践中的文化冲突原因和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

中山大学人类学张振江博士对香港早期的四个族群进行了研究。以语言和生活方式为准，早期香港的华人可以分成四个主体族群：本地、福佬、客家和蛋家。文章分析了这四个族群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们的合作和与殖民者的关系。

周大鸣与李居宁的论文探讨了澳门回归后土生葡人生存策略的变化。澳门回归后土生葡人失去了传统的优势，因此他们从语言的学习、就业选择、通婚等方面都改变了策略，以适应新的政治生态。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金虹硕士对韩国朝鲜族移民的生活状况的

描述提出了关于韩国朝鲜族认同的问题。并探讨在人际互动中偏见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他认为歧视是互动中明确表达出的偏见。

### 五、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研究发展趋向

总起来讲,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蓬勃兴起的现代城市化运动,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富裕、繁荣与工业文明,同时也引起了不少焦点问题,诸如民族问题、生态问题、城乡差别、贫富分化、性别差异等。相应,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也给予了持续的关注。

#### 1. 城市化进程与城市民族问题

早期关于城市化的研究集中在城市化的定义、城市化模式以及乡村城市化等层面。那个时候中国的城市化才刚刚起步,因此,除了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有所分歧和争论之外,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可说是怀着某种企盼、憧憬来欣赏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变化: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大片大片的良田没几天便成了工厂、开发区、高新区,马路、高架桥、地铁、机场、高速公路不时在编织着人们的交通经纬,各式娱乐场、球馆、健身中心、电话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所带来的各式问题便逐渐显露出来。

从人群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可分为城市人和外来人两类。城市人除了城市化所产生的共性问题如教育、失业与隐性失业、心理、健康等之外,突出的还有“城中村”问题、城乡结合部农民的生计转型问题等。而外来人最为彰显的就是农民工问题。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有着较强的区域性和地域性特点,如东部地区远高于中部、西部地区,中心城市远高于边远城市等,这就造成了农民工从中、西部到东部的“梯级”流动和从边远到中心的“向心”流动,因此,农民工问题实际隐含着民族问题,这在某些特殊的工作场所如深圳“民俗村”和城市如北京、广州等表现的尤其明显。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高速发展和地盘的不断

扩张使得那些重要城市和中心城市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和无限的容纳力，从而引起了人口的双向流动，西部少数民族进入城市的越来越多，同时东部地区流入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员也越来越多。这种人口的双向流动虽有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和共同发展，但同时也使得城市民族问题日趋复杂。

乡村都市化是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虽然人们对乡村都市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乡村都市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乡村人的生活方式，如饮食、衣着、打扮、语言、娱乐、休闲，甚至价值观念、人际交往等已渐趋城里人，这也就表明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有着极强的认同和依赖。而在这广大的乡村里面，理所当然包含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在这激烈的变动过程里面，自然亦涉及少数民族农民的社会转型与传统文化的保护发展问题。

与乡村都市化相关联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由于这些地方的城市化“样板”依然是现代城市理念，不仅仅城市人群身份、民族多样化，而且城市的布局、建筑风格、基础及文化教育设施、发展思路等都与沿海地区相差无几。而这种没有“个性”特色的城市化不仅使得少数民族地区中心城市面临着与中、东部的中心城市相同的民族问题，而且也相关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民族特色的高扬问题。

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将会是什么样子？记得笔者在多年前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城市化格局的研究，提出了“集镇市镇化，市镇城市化，小城市大城市化，大城市国际化”的“梯级”城市化模式，今天看来这已成现实。北京、上海、广州等自不必说，成都、西安、深圳、大连、青岛、桂林、武汉等等，都各自由于其经济、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吸引力而步入国际化大都市化的进程之中。尤其是随着国际区域合作及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深化，在中国沿边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少中小城市也开始向国际化都市迈进。如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广西、云南等省区将会涌现出一批新型的国际化都市，类似的情况还会出

现在如新疆、西藏、吉林、辽宁、黑龙江等省区。当然，这也表明城市的国际化不一定非要经过“大城市”化这个阶段。

城市的国际化引起了新的城市民族问题，这既表现在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的民族之间，也表现在同一国家、地区的不同民族之间，不管怎么样，它们都使得城市民族问题掺杂了国籍因素，日趋国际化，如来自不同国度的民族在经商、学习、工作等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他们的心理状态、精神信仰等。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定居、国民待遇、政治权利、教育机会等方面的问题。

### 2. 城市民族问题与多元文化共生生态

如果抛开政治的或经济的因素不谈，我们可以将城市民族问题还原为文化问题，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不容回避的基本问题。诚如众人所言，经济可以复苏，政治体制可以重建，但文化一旦消失，便是覆水难收，不再重来。

不同的民族在同一城市的聚合与交流，也必然产生文化的聚集与多样。因此，如何在这种聚集的情形下，建设城市多元文化的共生生态关系，保护并维持文化的多样性，妥善解决民族间的文化冲突，便是城市发展中不容回避的问题。

城市多元文化的共生生态，指的是伴随城市化而聚集到城市的各种文化都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与其他文化系统一道平等地享有生存、传播、弘扬和发展的权利与自由。其表现出的是城市多元文化的和谐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们在选择、认同、创造文化方面的权利与自由。这就要求我们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合理解决城市多元文化冲突。城市中文化的多样性势必导致文化间的冲突，其实质上反映的是各文化主体之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上的纷争，其集中表现为强势群体（权力阶层、精英阶层、富裕阶层）与弱势群体（平民阶层、大众阶层、贫穷阶层）之间的冲突，是强势群体文化霸权与弱势群体反文化霸权的有机统一。这两种文化冲突不断地撞击着弱势群体所承载的文



化底线，使社会陷入局部或整体的危机、混乱甚至战争状态。尤其是随着文化产业的日益发展，各文化主体为了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更是容易引起文化冲突，因此，必须找到合理的方式来消解这种文化冲突，理想地将冲突张力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

一般说来，合理的解决方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如通过选举、决策、税收、社会保障等制度或手段来调剂政治权利或社会财富的分配；二是内在的，即在文化发生冲突时，各种文化主体间应求得与他人、他群体的妥协与合作。两种方式相互整合，缺一不可。

（2）保护弱小文化。在容纳进城市的多元文化中，有相当部分是弱小文化，如进入大都市中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或宗教信仰等，这些弱小文化由于自我调节的功能相对较弱，因此在与主流文化或强势文化的接触、交流、冲突中，其文化的脆弱性就表现出来，以致很多仪式或风俗难以表现出来，这就须采取一些必要的保护措施，以维持其在城市中的生存。

在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的社会转型管理（Managem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s，MOST）研究规划中，多元文化和多元族群社会便是关注的重点之一。其目标是找出克服那些阻碍和平发展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和政策，以促使移入的少数群体能够融入当地社会。集中研究的问题有移入的少数群体在成为市民、享受社会基本服务的方面，所遇到政治的和偏见的阻力；防止冲突；提高公众的相互理解度和消除贫困等。“欧洲城市多元文化政策与公民权利模式（MPMC）”便是MOST的研究规划之一，该研究所提出的最广泛意义上的“公民权利”，就是接纳那些被排斥在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的人们，使其更加充分地参与到民主进程中去。<sup>①</sup>

这也就表明，对弱小文化的保护除了给其以宽松、优惠的环

<sup>①</sup> 斯蒂芬·韦尔托韦茨：《欧洲城市的多元文化政策与公民权利模式》，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2），31-43页。